

春去夏来,电影节又至,视听的饕餮早已潜伏于幕帷之后,只等着幕启的一刻,被放映机射出的那束强光瞬间点化释放。

世上的电影千千万万,有一类电影可以称作是关于电影的电影,如果这类电影让大家投票,我想毫无悬念,《天堂电影院》肯定排名第一,但如果继续追问,这部电影的导演又是谁,恐怕许多影迷一时未必能回答上来,他就是意大利导演朱塞佩·托纳多雷。

托纳多雷1956年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小镇巴盖里亚,青少年时期的托纳多雷曾在巴盖里亚的“加里波第电影院”打工,这段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,所以也可以说《天堂电影院》中的小托托,有着托纳多雷导演自身的一些影子。托纳多雷算不上是一位高产的电影导演,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他导演的故事长片仅有十部出头,但托纳多雷绝对是一位高质高效的导演,除了《天堂电影院》,观众所耳熟能详且津津乐道的《海上钢琴师》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均出自他手。1986年,三十岁的托纳多雷拍出了他的长篇处女作《被称为教授的男人》,这是一部风格冷峻的改编自黑手党头目真实经历的电影,但是票房并不成功,托纳多雷后来自嘲:“那时我以为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弗朗西斯·科波拉。”但仅仅过了两年,他的《天堂电影

那人那影

朱枫

院)就横空出世,一举获得了戛纳评审团大奖、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、英国电影学院奖等45项国际奖项。《天堂电影院》几乎被全球电影学院列为教材和典范,无数后辈导演和电影学子都受其启蒙与滋养,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托纳多雷堪称是导演中的导演。曾有人形容托纳多雷的电影如同“时光琥珀”,封存了个人与集体的记忆。

故乡与童年是托纳多雷永恒的主题,也可以说托纳多雷的电影是故乡与童年的一曲挽歌,在他的电影中故乡是回不去的地方,童年是无法重复的生命,故乡和童年只能在追忆之中,在胶片与光影之中复活。西西里的阳光、废墟、市井生活后来成为他电影的视觉符号,转换成《天堂电影院》中的广场、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的街道……故乡是唯美的,美如《天堂电影院》中梦幻的银幕,美如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中玛莲娜惹火的身影,但故乡又充满了噩梦,噩如焚毁天堂电影院的烈焰,噩如貌似淳朴的乡村小镇却充斥着对一个寡妇的集体暴力。

托纳多雷的镜头语言与叙事方式永远有一种凝视感,无论是对银幕的凝视,还是对少年心目中的女神的凝视,而当有女性

主义者错解影片是一种“男性凝视”时,托纳多雷则回应:“这是关于一个男孩如何通过目睹苦难成长为男人。”

故乡是无法再次抵达的,记忆中的故乡甚至是不真实的:故乡只是存在于回忆之中。

《海上钢琴师》中的那艘邮轮“弗吉尼亚号”犹如一个封闭的孤岛,象征了钢琴师1900的精神故乡,1900因恐惧陆地的“无限选择”而拒绝下船,其实和《天堂电影院》中的师父阿尔弗雷多对托托撕心裂肺的叮嘱“不要回来,永远不要回来”异曲而同工。

托纳多雷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,他将故事娓娓道来却从来不甘于平铺直叙,无论是《天堂电影院》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的倒叙、插叙交织并进,还是《海上钢琴师》的倒叙穿插旁白的嵌套式结构,都完美回答了电影叙事的终极之问:什么是好故事,如何来讲一个故事,怎样把一个好故事讲得更好。

毫无疑问:托纳多雷也是一位视听语言大师,他曾当过摄影师,对电影视觉魅力的呈现轻车熟路。《天堂电影院》的色彩隐喻和怀旧影调,《海上钢琴师》的充满虚幻感的奢华场景和超现实意味的镜,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中的唯美构图与承载着欲望与幻想的光影渲染,都成为他讲好他的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而在电影音乐的运用上,他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音乐家莫里康内的合作堪称杰出典范,众所周知莫里康内合作过许多电影导演大师,打造经典之作无数,但托纳多雷和他长达三十年的合作如臻化境,《天堂电影院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均由莫里康内操刀,在所有电影大师对莫里康内的合作以及对其电影音乐的理解中,托纳多雷的认知是最深彻的:“他的音乐不是伴奏,而是另一个角色。”迄今为止托纳多雷共获得一次奥斯卡奖、三次戛纳电影节奖、两次威尼斯电影节奖、四次欧洲电影奖。尽管获奖无数,但托纳多雷为人风格低调平淡,他的业余爱好是收集古董相机和电

东江水

廖书兰

不久前,香港特区政府为庆祝东江水供水6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。各大媒体不断地报道东江水,再次加深了香港市民对东江水的认识。东江水的源头在江西省,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流入广东省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东江水要输入香港,可说是一项艰巨的水利工程。从广东东莞的陶泵站抽取,经专用输水管道运到深圳水库,然后输至香港新界上水的木湖原水抽水站,全程83公里,再流经香港各水库或水塘,之后再流入香港的千家万户。在60多年前,香港严重水荒,如何解决缺水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工作,终于在1965年排除万难,东江水输入香港,解决了香港人用水的需求,有了源源不断的饮用水,也间接促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。香港人感谢祖国供给的水资源。此外,香港新界的一些居民也牺牲了祖屋、祖田、祠堂的土地作为储水的水库。例如东江水储量占九成的万宜水库,六条村庄像长江三峡的居民一样,都被水库淹没。其实,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鼓励香港市民走入乡郊,近距离接触与东江水相关的水务设施,感受东江水输送系统的来之不易。

编者按:202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3日开幕。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,是一座当之无愧的光影之城。而人人可参与,全城皆光影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更是影迷一年一度的节日。我们邀请您用千字文写下看电影、追电影节的趣事、囧事、难忘事(投稿邮箱:ygb@xmwb.com.cn),一起记录电影带给我们的那些闪闪发光的记忆吧。

1993年金秋十月,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开了它的帷幕,从那一天起我作为电影的从业者与影迷有了很多的交往。记得那年有两个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常在影城大堂等候明星。她们来自江苏,初到上海正好赶上电影节,她们对电影演员由衷喜爱,得知我是影城的工作人员时就问我,明星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大堂。正说着,滕文骥导演来到大堂,我说

你们不要老盯着演员,这才是应该追的明星。两个学生茫然地看着大胡子滕导。我介绍说他就是导演《黄河谣》《生活的颤音》《都市里的村庄》的滕文骥。我又向滕导介绍说,她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,喜欢电影。相见欢,滕导立刻满足了她们签名的要求。等到闭幕式那天,两位学生又见到了滕导。第二次相见,彼此话也多了,其中一位学生问滕导闭幕式有票吗,真想去看看,滕导听后连忙说,我来解决。不一会儿,两位学生如愿收到了两张大光明电影院闭幕式的票。如今一晃32年过去了,两位学生不知身在何方?但她们一定不会忘记滕导的热情,也一定记得电影节给他们带来无尽的欢乐。影迷是个特殊的群体,他们是银幕前的追光者。为了电影,他

们可奔赴千里,可以忍饥挨饿,他们让银幕成为永不褪色的梦境。我和许多影迷是朋友。记得2004年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,好莱坞著名影星梅丽尔·斯特里普来到影城,那一天我陪同她在四楼接受央视记者水均益的采访。访谈结束后,我们一行从电梯出来,此时一位年轻影迷迎上前来,求斯特里普签名。斯特里普二话不说,拿起笔就签,在她签名的那一刻,同事按下了快门。当照片到我手里时,如何给这位影迷成了我的难题。有趣的是,很多年后,有一次我在微博上看到了这位影迷回忆了这次签名。于

是,这张照片终于到了他的手中,这对他来说,是多么地珍贵啊!今年,我又在影城遇到了他。他说,你又要忙了。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,却有着彼此相知的暖意。

银幕前的追光者

王佳彦

还有一位留着大胡子的年轻影迷,每次活动都能见到他的身影,而每次见面都要和我合影,说照片我都留着。一次在浦东图书馆,我陪潘虹办完活动从边门出来准备上车,我又见到他远远地等候着。见到我们,他赶紧跑了过来请潘虹签名,我和潘虹说这是我的朋友,潘虹欣然允诺,我为他拍下了签名时的照片。年初上海影评人奖在胜利电影院颁奖,席间我出来休息,又看到了他,我说怎么又是你,他说想让张建亚导演签个名,我说我带你上去吧,他说不去打扰,就在这等着。我说不

听着音乐劈柴的女人

海男

远远地我就听见了歌声,这是阿细跳月的歌声。这是一个由梦乡和溪水环绕之地,也是可以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、从西方落山的地方。每天早起,我就站在窗前看日出升起的山岗。此刻,很多人都应该起床了,夜晚,让我们回到一张安静的床上,它像田垄又像仓库,更像海洋上的一座岛屿,是啊,人在劳作之后都需要躺平身体,让自己有一个无忧无虑的梦境。

看得见日出从山岗升起的人,都是饱受日照照耀的人,我是其中之一,所以,我每天都以自己的方式向永恒的太阳致敬。看见日出的人,转眼之间已经开始劳作了,倘若你的双手没有抚平皱褶,没有用力,倘若你的身体没有纵横过荒野,没有看见过碧蓝的河流,那么,你的心灵如何去陈述你开始出发故事?这些从脚下不断出现的小巷道,好像总走不完。在古代,人们更重视日月的照耀,只有一个有光和夜的地方,才能筑起安居人心的屋宇。

音乐离我们更近了,像是阿细女人的千针万线绣出的一条长河……哦,便出现了眼前的这一幕: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,她背对着我们在劈柴,坐在一处背阴的地方举着柴刀又放下,太阳已经从远方过来了,太阳已经照在了屋顶上,太阳就要过来了。太阳已经照在了她不远处的叶子上面,房前屋后的菜地上都是绿得让你想唱歌的叶子。

在女人劈柴的台阶上,放着一台唱机,里边播放的是阿细跳月的歌声。她在劳动时依然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装。在她的后背上我看见了绣出的花朵旁有一对喜鹊,仿佛已经飞了起来。我离开了,听着音乐的女人继续劈柴……



风细柳斜 (中国画)

陈春韬

影放映机,平时喜欢在家中摆弄他那超过200台的收藏,其中既有好莱坞黄金时代拍摄黑白电影的Mitchell BNC 35mm摄影机,又有在《天堂电影院》中作为道具的(Cinemeccanica Victoria 5)放映机,托纳多雷的收藏不仅是对电影技术的迷恋,也体现了他对胶片时代的怀念。

这次能请动托纳多雷出任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,让上海人能近距离接触到这位“电影太出名,但人没电影有名”的大宗师,不仅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

翻阅丁利刚编《陈翰笙书信集》,宋庆龄于1976年7月7日致陈翰笙的一通信函及随后的《陈翰笙为宋庆龄代拟〈追忆鲁迅先生〉》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函文称:“当萧伯纳(在上海)短暂停留时,来参加在我寓所设的午餐会,在场的客人还有鲁迅、蔡元培、林语堂、伊罗生和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。”宋庆龄的这封信件亦载《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》一书,其注释:“1933年2月17日,作环游世界旅行的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偕夫人乘英轮皇后号于晨6时抵吴淞口,宋庆龄偕杨杏佛等乘海关小轮前往吴淞口欢迎,并上英轮皇后号访萧伯纳,相见甚欢。10时30分,宋庆龄陪同萧伯纳下船登岸,先赴外白渡桥理查饭店与同时来沪各游历团团员相见,稍作寒暄。随即赴亚尔培路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。12时,宋庆龄陪同萧伯纳来到莫利爱路寓所,并设中式肴饌招待,蔡元培、鲁迅、杨杏佛、林语堂、伊罗生、史沫特莱等出席作陪。……宋庆龄与萧伯纳曾就中国局势等问题作详谈。”

对宋函及注释,有材料略作补正,贾植芳的《我的人生档案:贾植芳回忆录》中有题为《狱友邵洵美》的文章。贾先生回忆在提篮桥监狱与邵洵美共处的那段往事时提到,他和邵洵美同监四个月,当时正值困难时期。饥饿的监房生活使邵洵美的哮喘病和浮肿病日益严重。邵洵美感到自己能出狱与亲人重逢的希望渺茫。有一天,他郑重其事地对贾先生说:“贾兄,你比我年轻,身体又好,总有一日会出去的,我有两件事,你一定要写篇文章,替我说几句话,那我就死而瞑目了。第一件是1933年,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,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。萧伯纳不吃荤,所以,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,在‘功德林’摆了一桌素菜,用了四十六块银元,由我自己出钱付的。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、宋庆龄、鲁迅、杨杏佛,还有我和林语堂。但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,都没有我的名字。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,希望你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,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。还有一件,我的文章,是写得不好,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。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‘捐班’,是花钱雇人代写的,这真是天大误会。我敬佩鲁迅先生,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!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。”由于这是在当时监房里的秘密谈话,可能贾先生没有听清,那是从“功德林”叫了一桌素菜,而不是在“功德林”设宴。从邵洵美郑重其事的表述中,可知当年邵洵美作为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会计,出资赞助了招待萧伯纳的午宴,并在宋宅出席作陪。

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,充满了人性的质感。

割白菜

陈霞

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自家菜地里割白菜。跟着父亲来到菜地,只见一棵棵白菜站在田里,如一片绿色海洋,在微风里泛起一朵一朵绿色的浪花,风吹过来有一阵草木香。年幼的我置身这片绿色波浪,快乐极了。

父亲拿起菜刀弯下腰开始割白菜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面前的白菜分明比我还高,我高兴地割下一棵,大声喊着:阿爹,阿爹,我割了一颗白菜。又学着父亲把割下来的菜放在脚边,只见父亲脚边一排排整齐的白菜像一条绿白色大道,通往前方。我割着白菜,东张西望,一会儿看天空的云彩,一会儿埋头割一棵菜,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父亲把这些菜装在瓮里,大手一挥:回家吧!父亲步履豪迈,挑着一担白菜回家,小小的我一路紧跟,走在乡间小路上。小镇人家有腌菜的传统,我家也不例外。母亲将这些白菜放在家门口摊开晾晒,晒到菜叶渐渐发蔫。父亲下班回来已经天黑了,他匆匆扒口饭,就开始把这些菜放进缸里,每铺一层菜后撒上一层粗盐,他赤脚跳进缸里踏腌菜,踏好菜后父亲再用几块石头把菜压实。父亲踏的腌菜特别咸鲜与清香,是我家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下饭“神器”。暖锅里腌菜作底,配上猪肉或者牛肉,放点冬笋,炖着,香喷喷,鲜滋滋,炖的时间越长越入味好吃,这是我记忆里难忘的一道家常菜,怎么也吃不厌。

时光远去,童年的快乐至今记忆犹新。每当回到家乡,在那片绿色前站一会儿,回味儿时跟着父亲割白菜的情景,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十日谈

影迷的故事 责编:吴南瑶

我的观影生涯应该从襁褓中开始。